·经济学研究·
DOI:10.20004/j.cnki.ujn.2026.01.008

市场准入管制放松能否促进居民消费?

宁静波　赵晓光　韩沅成

[摘　要]市场准入管制放松能够优化商品和服务供给、增加就业,从而影响居民消费。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作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运用双重差分法,使用地级市面板数据识别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居民消费行为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机制检验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促进供给多元化、促进就业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居民消费;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以及居民消费水平较低的城市中更明显。研究结论为我国完善市场准入制度与大力提振消费提供了政策启示。

[关键词]市场准入管制;居民消费;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

一、引言

提振消费是畅通国内大循环的重要突破口和着力点,关系着经济发展和民生改善。2024年我国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同比增长3.5%,比2023年回落3.7个百分点①,这表明有效需求不足以及消费不振仍然是当前我国经济发展面临的挑战和问题之一。在此背景下,国家对提振消费给予高度重视。2025年我国《政府工作报告》强调"从放宽准入、减少限制、优化监管等方面入手,扩大健康、养老、助残、托幼、家政等多元化服务供给"。同年出台的《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要求"完善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模式,以环保、卫生、安保、质检、消防等领域为重点,深入清理整治各类市场准入壁垒"。"十五五"规划建议提出"以放宽准入、业态融合为重点扩大服务消费"。由此可见,完善市场准入制度对提振消费、促进国内大循环具有重要影响。

消费增长的实现离不开制度环境的支撑,从制度视角解释消费问题,能更深刻地揭示消费增长的深层逻辑与长效动力。从制度经济学的角度分析,制度创新滞后所引发的制度供给不足及制度性交易成本过高是我国在扩大内需特别是提升消费需求过程中面临的真正障碍,相反,一套良好的制度安排不仅能激励生产性努力,促进社会财富的增长,还能在既定财富条件下实现公平与效率并重的分配格局,从而有效推动内需扩大与消费提升②。

市场准入制度是我国市场经济的基础性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则是我国在市场准入领域进行的关键性改革,其"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负面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目的在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教育学青年项目"我国免费教育政策的消费提振效应评估研究"(项目编号:CKA250316);山东省社会科学规划研究专项"新阶段山'一带一路'海外园区建设与发展提升路径研究"(项目编号:23CKFJ25)。

[作者简介]宁静波,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赵晓光,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韩沅成(通讯作者),山东师范大学经济学院博士研究生,邮箱:accountanthyc@163.com。

①王昌林:《以提振消费为重点全方位扩大内需》,《求是》,2025年第5期。

②刘志彪:《我国扩大内需尤其消费需求的潜力:总量、结构与制度》,《江淮论坛》,2025年第4期。

于破除市场准入领域的不合理限制和隐性壁垒,降低市场准入门槛并放宽市场准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不仅能够引导和鼓励更多数量和类型的企业进入市场,进而增加市场中产品和服务的供给种类与数量,为居民提供多元化的消费选择;还能够通过促进企业的创立与发展带动就业机会增加,更多的居民实现就业意味着家庭收入的稳定增长,进而有助于增强居民的消费能力,因此,该制度可以从优化供给和增加收入等维度为消费增长注入动力。

与本文密切相关的文献有两支。一支文献是关于制度层面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研究发现,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能够影响居民的消费行为。一方面,税收制度、户籍制度以及养老保险制度等均是影响居民消费的重要正式制度[①]。另一方面,儒家文化等非正式制度也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②]。另一支文献是关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经济效应的研究。现有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宏观层面能够缩小城乡收入差距[③]、促进城市创新和创业以及促进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④],在微观层面能够提高企业投资效率、促进企业技术创新和垂直专业化、促进企业并购以及降低企业债务融资成本[⑤]。然而,少有学者关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于居民消费产生何种影响,其中的传导机制也未得到揭示。基于此,本文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放松市场准入管制的准自然实验,使用中国地级市面板数据构建双重差分模型,分析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以及其中的作用机制。

本文可能的边际贡献在于:第一,补充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经济效应的研究成果。以往关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效果的研究大多停留在企业层面,鲜有文章考虑该制度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本文以居民消费为落脚点,探寻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扩大内需效果,是对市场准入管制放松领域已有文献的丰富和补充。第二,扩展了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维度。现有研究对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探讨已形成多重视角,但从市场准入管制放松这一制度性因素切入的研究尚不多见。本文通过理论与实证分析,揭示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居民消费之间的关系,扩展了居民消费影响因素的研究边界。第三,厘清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影响居民消费的作用机制。本文剖析了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促进供给多元化、促进就业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三大路径作用于居民消费的具体逻辑,搭建了负面清单制度影响居民消费的理论分析框架。

二、研究背景与理论分析

(一)研究背景

1.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概况

在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之前,我国对于市场准入管制的便利性、公平性、透明性不足,

①曲一申,臧旭恒,李清杨:《房产税改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支出的影响——来自2011年房产税改革试点的证据》,《济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3年第3期;毛盛志,王军辉,张吉鹏:《户籍制度改革对城镇居民家庭消费的影响》,《中国农村经济》,2025年第1期。

②田子方,李涛,伏霖:《家庭关系与居民消费》,《经济研究》,2022年第6期。

③胡润哲,梅慧璇,魏君英:《"桥梁"还是"鸿沟"?新质生产力对城乡消费差距的影响》,《经济与管理研究》,2025年第12期。

④雷卓骏,黄凌云,张宽:《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城乡收入差距》,《财贸经济》,2023年第5期;雷卓骏,刘晔:《制度创新何以赋能区域创新:来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模式的证据》,《中国软科学》,2024年第9期;方观富,冯其昂,朱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城市创业活跃度》,《经济评论》,2025年第1期。

⑤王雄元,徐晶:《放松市场准入管制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的准自然实验》,《金融研究》,2022年第9期;周志方,韩尚杰,程序:《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创新——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财经研究》,2023年第11期。

存在严进疏管、地方保护等问题[①],不利于各类市场主体之间的公平竞争。在此背景下,2013年,党的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实行统一的市场准入制度”,2015年,《国务院关于实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意见》明确了制度内容,提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是指国务院以清单方式明确列出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境内禁止和限制投资经营的行业、领域、业务等,各级政府依法采取相应管理措施的一系列制度安排”。这项制度的主要特征在于:第一,法无禁止即可为。对于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各类企业皆可依法平等进入,并且不允许各地区各部门自行出台额外的审批措施,这有助于避免地方政府设置各类市场准入隐形壁垒,赋予所有企业公平竞争的市场环境。第二,一单尽列。不同于正面清单管理模式下市场准入规定“碎片化”的现象[②],负面清单将所有禁止、许可准入事项均列在一张清单上。第三,全国统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严格落实“全国一张单”管理模式,有助于规制地方保护主义行为,促进要素资源的自由流动。

2016年,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开始落地实施,首批试点地区为上海市、天津市、广东省和福建省。2017年,我国继续扩大该项制度的试点范围,新增重庆市、吉林省、陕西省、浙江省、四川省、湖南省、贵州省、河南省、黑龙江省、湖北省和辽宁省11个试点地区。2018年末,《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18年版)》的发布标志着该项制度在全国范围内(不包含港澳台地区)推行。此后,我国持续对负面清单进行修订,截至2025年9月,已经更新了2019年版、2020年版、2022年版、2025年版四个版本。

从制度实践来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破除隐性准入壁垒,逐步构建起公平开放的市场环境,这一制度变革不仅重塑了市场主体的准入逻辑,更从供给端为居民消费创造了基础性条件,随着更多企业进入此前受限的一些领域,市场供给的多样性、产品与服务的质量均有望得到提升,从而为消费增长注入动力。在此背景下,该制度的分阶段推进形成了天然的“准自然实验”场景,不同地区在不同时间点先后纳入制度实施范围,使得未实施地区与实施地区之间形成了可比较的对照组与处理组。基于此,本文通过双重差分法剥离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这一核心变量的净效应,以此识别其对居民消费的影响方向与程度,从而为理解制度变革与消费提振的内在关联提供依据。

2. 消费不足问题的概况

当前,我国仍存在居民消费动力不足的问题。从消费率变化来看,在2004年之前,我国居民消费率(居民消费占GDP的比重)大体保持在40%以上,之后逐渐回落至2010年34.6%的低点,此后,居民消费率大体稳定在35%至40%之间,2023年,我国居民消费率为39.2%,远低于全球56.5%的平均水平[③]。我国居民消费潜力未能充分释放,其背后存在多重结构性因素。

从需求侧来看,就业压力较大与收入预期不稳是限制居民消费能力的重要因素。当前,全球经济形势的复杂性与不确定性迫使众多企业采取更为灵活的用工方式以增强组织韧性、应对生存危机。与此同时,人工智能和大数据等数字技术的迅猛发展对重复性、流程化的传统岗位造成巨大冲击,加剧了结构性失业风险[④]。家庭负债通过加剧流动性约束与财务脆弱性抑制居民消费[⑤]。在此基础上,我国就业市场面临的较大压力增加了居民对未来收入和就业的不安全感,降低了居民的消费意愿[⑥]。

①郭冠男,李晓琳:《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管理制度与路径选择:一个总体框架》,《改革》,2015年第7期。

②孔祥利,张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导规范民营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制度安排与施策重点》,《南开经济研究》,2023年第12期。

③王一鸣:《扩大内需要更加注重补上消费短板》,《人民政协报》,2025年4月10日第3版。

④王晓丹,周十同,石玉堂:《人工智能的就业效应——基于双重机器学习的因果推断》,《商业经济与管理》,2025年第7期;蒋帆,魏东霞:《我国城镇在职人口就业稳定性的变化趋势分析》,《南方人口》,2025年第2期。

⑤杨雨佳,易行健,杨碧云:《家庭负债、数字经济与居民消费》,《北京工商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4年第6期。

⑥姚鹏,王雨彤:《公共消费能否牵动居民消费》,《财贸经济》,2025年第5期。

从供给侧来看,高质量产品与服务有效供给不足是抑制居民消费意愿的关键因素。当前,我国经济存在需求向服务集中、供给向制造业倾斜的结构性失衡,一般制造业产能过剩与现代服务业供给短缺并存,难以满足部分收入群体的消费需求[①]。对高收入群体而言,其消费需求已向高质量产品和服务领域集中,尤其是医疗、教育、养老以及文化等高品质服务领域,但是我国服务业发展水平仍显滞后,数据显示,2024年我国居民人均服务性消费支出占人均消费支出比重为46.1%,相较于发达国家,这一比例仍有较大提升空间[②]。这种供需错配不仅抑制了高收入群体的消费意愿,也导致部分消费需求转向海外市场,从而制约了国内消费市场的扩容与升级。

(二)理论分析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助于清除存在于许多行业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隐性准入壁垒,允许更多企业进入市场,从而提高了市场竞争程度。加剧的竞争迫使企业通过提升生产效率、降低生产成本来生存和发展,生产成本的降低会带来产品价格的下降[③],从而直接增强消费者购买力与购买意愿。同时,新进入企业为了立足,往往会引入新技术、新理念和新商业模式,这有助于丰富市场上产品和服务的种类,进而能够更好地匹配消费者多元化、个性化的需求,从而创造新的消费增长点。此外,更多企业进入市场能够拓宽企业的供应商选择范围,促进其供应商结构的多元化,有效降低供应商集中度[④]。当供应商集中度处于较低水平时,企业能够将原材料采购分散至多个不同供应商,减少对单一供应商企业的依赖,进而增强其在采购谈判中的议价能力[⑤]。这一机制有助于降低企业的原材料采购成本与整体生产成本,生产成本的下降将传导至产品价格端,推动价格下降,从而有助于激发居民的消费意愿,促进消费增长。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1: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促进居民消费。

综上所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助于为促进居民消费提供动力。在此基础上,本文认为,该制度主要通过促进供给多元化、促进就业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三大机制拉动居民消费。具体分析如下:

1.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提升市场供给激发居民消费需求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助于促进供给多元化。第一,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多元化依赖于市场结构,而市场结构又由进入和退出壁垒决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明确规定清单以外的行业和领域各类市场主体皆可依法平等进入,这打破了长期以来存在于许多行业(尤其是服务业和部分垄断性行业)的"玻璃门""弹簧门""旋转门"等隐性准入壁垒,使得民营企业、中小企业不再因所有制、规模等原因而被隐性排除在市场之外,从而市场上会涌现出大量新的企业,它们带来新的品牌和新的商业模式,进而有助于促进供给多元化。第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驱动企业进行差异化竞争,催生供给的多元化格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降低企业的制度性进入成本,能够促使大量企业进入曾经受限的行业和领域进行投资,进而提高市场竞争程度[⑥],企业为了在激烈的竞争中取得优势地位,会产生开展创新活动以提供差异化产品供给的动机[⑦],从而有助于塑造出丰富多元的市场供给体系。

---

①刘志彪:《我国扩大内需尤其消费需求的潜力:总量、结构与制度》,《江淮论坛》,2025年第4期。

②王文涛:《多措并举扩大服务消费》,《求是》,2025年第8期。

③韩胜飞,宁颖斌,陈林:《放松市场准入规制能否提升自然垄断行业绩效?》,《财经问题研究》,2023年第10期。

④郭娟娟,徐乾宇:《放松市场准入管制对中国企业供应链配置多元化的影响》,《经济理论与经济管理》,2025年第3期。

⑤李颖,吴彦辰,田祥宇:《企业ESG表现与供应链话语权》,《财经研究》,2023年第8期。

⑥王雄元,徐晶:《放松市场准入管制提高了企业投资效率吗——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试点的准自然实验》,《金融研究》,2022年第9期。

⑦周志方,韩尚杰,程序:《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创新——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准自然实验》,《财经研究》,2023年第11期。

供给多元化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第一,供给多元化能够更好地满足市场多样化和个性化的需求,从而促进居民消费。消费者的需求偏好是具有异质性的[①],供给多元化意味着产品和服务在功能、设计、品牌、文化内涵等方面呈现出丰富性,这使得不同年龄、收入、地域、文化背景的消费者更有机会找到贴合自己个性化偏好的选择,从而提高消费者的消费意愿,达成他们的购买行为。第二,供给和需求是一体两面,新需求可以催生新供给,新供给可以创造新需求[②],多元化的供给有助于推动产品向更细分、更专业的领域发展,从而挖掘出潜在的市场需求,拓展传统消费的边界。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2: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促进供给多元化促进居民消费。

2.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促进就业减少居民消费支出约束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助于促进就业。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蕴含着"法无禁止即可为"的法治思维,强调清单以外的行业领域所有企业都可以依法平等进入,这有助于规制地方政府在市场准入领域的过度干预,降低企业的市场准入门槛,进而提高城市的创业活跃度,催生大量新企业[③]。新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能够为劳动力市场创造新的就业岗位。进一步地,由于这一制度破除了市场准入环节的所有制歧视,所以民营经济的发展空间得到了极大拓展[④],而民营企业是吸纳就业的主力军,贡献了我国80%以上的城镇劳动就业,因此,消除对民营企业的歧视性准入限制使得就业增长的根基更为坚实。

促进就业能够提高居民消费的积极性。就业是居民获得收入的重要途径,促进就业有助于提高社会整体的劳动收入水平。虽然我国居民收入日趋多元,但是劳动收入仍然是大部分居民的主要收入来源[⑤],所以劳动收入的增加使得居民拥有更多的可支配收入,从而有更多资金用于消费。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3: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促进就业刺激居民消费。

3.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优化资源配置更好满足居民消费需求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第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行"全国一张单"的管理模式,要求各地区不得另行制定市场准入性质的负面清单,这种全国统一市场准入的制度安排能够限制地方政府的保护主义行为,进而厘清政府的权力边界,更好地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性作用,使得要素资源更好地依靠市场价格机制在地区间进行高效配置[⑥]。第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后,企业可以根据自身的技术、资金以及对市场的判断,更自由地进入各个领域进行投资,这使得资源能够更高效地响应市场需求并流向效率最高、最能创造价值的地方,而非因为政府地方保护主义等不当干预行为流向低效甚至僵尸企业,从而有助于优化资源配置。

优化资源配置能够促进居民消费。第一,地区资源配置的优化能够通过提升生产要素的利用效率等方式推动商品单位边际成本下降,并且由于商品定价通常会嵌入其成本构成,所以单位边际成本的下降会进一步传导至商品价格层面,促使商品价格降低[⑦],进而提升居民的实际购买力,

①何祚宇,李敬子,陈强远:《目的市场异质性消费者偏好与中国出口企业创新》,《数量经济技术经济研究》,2023年第8期。

②金观平:《以优质供给创造新需求》,《经济日报》,2025年4月21日第1版。

③方观富,冯其昂,朱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城市创业活跃度》,《经济评论》,2025年第1期。

④孔祥利,张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导规范民营经济发展的价值导向、制度安排与施策重点》,《南开经济研究》,2023年第12期。

⑤徐玉德,刘晓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对企业劳动收入份额的影响研究》,《财政研究》,2023年第11期。

⑥张宽,雷卓骏,李后建:《市场准入管制与企业全要素生产率:来自负面清单的证据》,《世界经济》,2023年第5期。

⑦詹姝珂,王仁曾,危仁义等:《数字金融如何助力统一消费市场建设——基于双区域消费系统理论框架的研究》,《经济学动态》,2025年第6期。

提高居民的消费意愿和消费能力。第二,资源的优化配置意味着在市场机制作用下资源能够流向高需求的产业,推动相关产业的规模化和高质量发展,从而更好地实现产品供给结构与市场需求的匹配[①],这一过程能够有效提升供给体系对国内需求的适配性,有助于激发潜在的消费意愿,促进居民消费。据此,本文提出如下假说:

H4: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居民消费。

三、研究设计

(一)样本选择与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2012—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原因如下:第一,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于2016年开始试点,并于2018年末在全国范围内推广,这意味着在2018年之后只有处理组样本,缺乏对照组样本,从而难以将处理效应与其他可能影响结果的时间变化因素区分开来[②]。第二,2019年新冠肺炎疫情的发生对居民消费行为产生显著冲击[③]。因此,为保证双重差分方法的有效性,确保研究设计中对照组的存在,并排除新冠肺炎疫情对回归结果带来的干扰,本文按照其他研究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文章的做法[④],将观测窗口截止于2018年,使用2012—2018年地级市面板数据作为研究样本。

2018年之后的这段时间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影响持续深化,居民消费作为经济运行的重要组成部分,必然也会受到这一制度在全面推广阶段所产生的影响。因此,为了考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2019年进入全面推广阶段之后对居民消费产生的影响,避免因样本窗口过早截止而遗漏制度在后期产生的重要效应,本文参考杨仁发和陆瑶的做法[⑤],将样本观测窗口延长至2023年,以此构建2012—2023年地级市面板数据进行实证检验。

本文所使用的数据主要来源于《中国城市统计年鉴》、各地市统计年鉴、国家知识产权局、WIND数据库以及CSMAR数据库等。少量缺失数据用插值法补齐。

(二)模型设定

为定量考察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本文设定如下基准回归模型:

$$Consume_{i,t} = \beta_0 + \beta_1 DID_{i,t} + \alpha \sum Controls_{i,t} + City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1)$$

式(1)中,i表示城市,t表示年份。$Consume_{i,t}$为居民消费水平代理变量;β_0为截距项;$DID_{i,t}$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变量;β_1用以衡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Controls_{i,t}$是一系列控制变量;$City$和$Year$分别为城市与年份固定效应;$\varepsilon_{i,t}$为随机扰动项。

(三)变量定义与描述

1. 被解释变量:居民消费水平

居民消费水平($Consume$):居民人均消费支出是衡量社会经济发展和民生福祉的关键指标,能够直观反映居民物质生活水平的高低,可以深层次地体现一个国家或地区居民生活质量的整体状况。因此,本文使用城镇居民人均消费支出的对数来衡量居民消费水平。

---

①肖兴志,李少林:《大变局下的产业链韧性:生成逻辑、实践关切与政策取向》,《改革》,2022年第11期。

②方观富,冯其昂,朱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城市创业活跃度》,《经济评论》,2025年第1期。

③刘洪波,邸建亮,王冉:《新冠肺炎疫情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统计研究》,2022年第5期。

④雷卓骏,刘晔:《制度创新何以赋能区域创新:来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模式的证据》,《中国软科学》,2024年第9期;方观富,冯其昂,朱颖:《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与城市创业活跃度》,《经济评论》,2025年第1期;朱晓满,王伊攀:《制度型开放政策如何影响"稳外资"——基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经验证据》,《国际经贸探索》,2025年第1期。

⑤杨仁发,陆瑶:《市场准入管制放松与企业长期投资——兼论耐心资本的形成》,《中国工业经济》,2025年第6期。

2. 解释变量: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

本文核心解释变量$DID_{i,t}$为i城市t年是否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以省级行政区作为政策实施单元,当某省份被纳入政策实施范围后,该省管辖下的所有地级市均可被视为受到政策冲击的处理组。具体而言,若地级市i所在省级行政区在t年实施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则定义该地级市在t年及之后的*DID*为1,反之为0。

3. 控制变量

借鉴既有研究,本文选取城市层面的控制变量包括:(1)地方经济发展水平(*Growth*),使用GDP增长率表征。(2)地方财政支出(*Gov*),使用地方政府一般预算内支出取对数表征。(3)金融发展(*Fina*),以金融机构存贷款额与GDP之比衡量。(4)城镇化率(*Urban*),使用城镇常住人口与地方总人口数的比值度量。(5)市场化水平(*Market*),参考樊纲等的研究①,并按照程开明等的方法计算地级市的市场化指数②,以此衡量市场化水平。(6)产业结构高级化(*Struc*),使用三产增加值与二产增加值的比值表示。

四、实证结果分析

(一)基准回归结果

基准回归结果如表1所示。列(1)初步构建回归方程,结果显示核心解释变量*DID*的估计系数为0.277,且在1%统计水平上显著,初步验证政策干预的积极效应。为增强模型有效性,列(2)进一步引入时间与个体双固定效应以控制不可观测因素干扰,列(3)纳入所有控制变量,可以发现,*DID*系数均在1%水平上显著为正。进一步地,列(4)、列(5)汇报了考虑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全面推行情况(即将样本时间延长至2023年)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到,无论是否加入控制变量,政策变量的回归系数均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为正。表1的结果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居民消费,假设H1得到验证。

表1　基准回归

变量	(1)	(2)	(3)	(4)	(5)
			Consume		
DID	0.277***	0.034***	0.034***	0.019***	0.018***
	(0.016)	(0.009)	(0.009)	(0.005)	(0.005)
Growth			-0.001		0.002**
			(0.001)		(0.001)
Gov			0.023		0.042***
			(0.021)		(0.015)
Fina			0.004		-0.006
			(0.005)		(0.004)
Urban			0.018		0.145***
			(0.078)		(0.055)
Market			0.003		-0.001
			(0.006)		(0.004)
Struc			0.119***		0.027***
			(0.021)		(0.007)

①樊纲,王小鲁,马光荣:《中国市场化进程对经济增长的贡献》,《经济研究》,2011年第9期。

②程开明,滕蔓洲,刘书成:《中国经济增长新动能探源:基于偏向型技术进步视角》,《统计与信息论坛》,2025年第11期。

续表

变量	(1)	(2)	(3)	(4)	(5)
	Consume				
常数项	9.764***	9.807***	9.304***	9.907***	9.193***
	(0.013)	(0.002)	(0.324)	(0.003)	(0.233)
年份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效应	否	是	是	是	是
观测值	1974	1974	1974	3384	3384
R^2	0.133	0.887	0.890	0.938	0.941

注:***、**与*分别表示在1%、5%及10%的水平显著,括号内为稳健标准误。下表同。

(二)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有效性检验

1. 平行趋势检验

平行趋势检验是双重差分分析中的一个重要假设,用于验证实验组和对照组在政策实施前的趋势是否相似。如果没有政策干预,实验组和对照组的趋势应该保持平行。本文构建如下模型进行平行趋势检验:

$$Consume_{i,t} = \beta_0 + \sum_{t=2012}^{2018} \beta_t event_t + \alpha \sum Controls_{i,t} + City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2)$$

式(2)中,基于事件研究法,分别对政策实施前4年至后2年共计6年的政策虚拟变量$event_t$进行回归,同时为避免多重共线性,参照Freyaldenhoven等的做法[①],选择政策实施前一期为基期,检验多时点*DID*估计是否满足平行趋势假定。平行趋势检验如图1所示,结果显示,政策实施之前$event_t$的系数不显著,说明政策实施前实验组与对照组居民消费水平的变化趋势不存在显著差异,符合平行趋势假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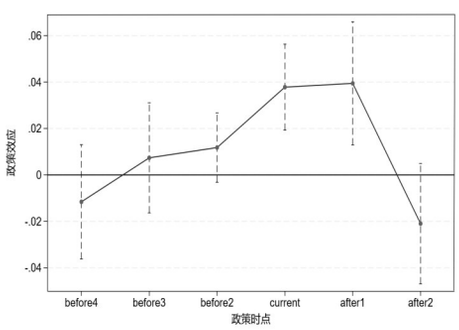


图1 平行趋势检验

2. 安慰剂检验

为确保居民消费水平提高的净效应来自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政策冲击,本文参考Li等的方法进行安慰剂检验[②],以排除结果源自随机因素或系统性偏误的可能性。具体而言,本文通过随机化处理状态构建伪政策冲击:首先随机指定虚构处理组;其次随机设定政策实施时间点;最后执行500次抽样和估计模拟获取伪处理效应估计值$\beta^{placebo}$的分布。图2结果表明,伪处理效应$\beta^{placebo}$估计值集中于零值附近且多数不显著,而真实政策效应估计值0.034显著偏离该分布。安慰剂检验结

①Freyaldenhoven S., Hansen C., Shapiro J. M., Pre-event trends in the panel event-study design, *American economic review*, Vol. 109, No. 9, 2019, pp. 3307-3338.

②Li P., Lu Y., Wang J., Does flattening government improve economic performance? Evidence from China, *Journal of development economics*, Vol. 123, 2016, pp. 18-37.

果有力支持本文识别策略的有效性,表明观测到的居民消费水平变化确由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引起,而非其他不可观测因素的干扰。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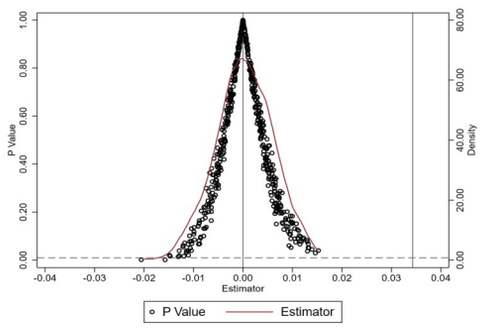


图2　安慰剂检验

(三)稳健性检验

1. 估计偏误诊断:Bacon分解

值得注意的是,当多时点双重差分模型在双向固定效应框架下进行估计时,可能会产生系统性偏误,从而影响政策评估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基于此,本文采用Goodman-Bacon分解进行偏误诊断,以判断本文估计结果的准确性。分解结果显示,本文的估计效应主要依赖于处理组与未处理组的比较,权重为90.7%,并且"坏对照组"这一组别的权重仅为6.2%,由此可知,异质性处理效应对本文基准回归结果的影响较弱,本文的回归结果是稳健的。

2. PSM-DID检验

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试点的实施可能面临"自我选择偏差"问题,并且可能受到双向因果关系的"内生性问题"影响,从而导致估计结果出现偏差。为消除这些噪音,本文进行PSM-DID检验。参考王庶等和谢申祥等的研究①,使用1:1近邻匹配、半径匹配和核匹配方法,从未实施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城市中筛选倾向得分最接近者作为对照组,重新估计式(1)。回归结果如表2列(1)—列(3)所示,三种匹配方法下*DID*的系数均显著为正,证明了本文结论的稳健性。

表2　稳健性检验

变量	(1) 1:1最近邻匹配	(2) 半径匹配	(3) 核匹配	(4) 替换被解释变量
DID	0.040***	0.034***	0.035***	0.015***
	(0.011)	(0.009)	(0.009)	(0.003)
常数项	8.571***	9.268***	9.265***	1.625***
	(0.420)	(0.336)	(0.335)	(0.181)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990	1958	1966	1974
R^2	0.905	0.889	0.889	0.928

①王庶,岳希明:《退耕还林、非农就业与农民增收——基于21省面板数据的双重差分分析》,《经济研究》,2017年第4期;谢申祥,范鹏飞,宛圆渊:《传统PSM-DID模型的改进与应用》,《统计研究》,2021年第2期。

3. 替换被解释变量

本文借鉴张林等的研究[①],采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与国内生产总值之比衡量居民消费水平,在保持基准模型规范不变的情况下,考察政策效应估计在不同消费测度下的一致性。表2列(4)的结果证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居民消费水平的影响方向和显著性均保持稳定,基准结果是可靠的[②]。

五、机制检验与异质性分析

(一)机制检验

为检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政策实施能否通过促进供给多元化、促进就业以及优化资源配置来提高居民消费水平,本文借鉴江艇等的研究[③],构建以下计量模型:

$$M_{i,t} = a_0 + a_1 DID_{i,t} + \alpha \sum Controls_{i,t} + City_i + Year_t + \varepsilon_{i,t} \quad (3)$$

式(3)中,$M_{i,t}$是机制变量,分别代表供给多元化(*Supply1*、*Supply2*)、就业水平(*Employment*)和资源配置(*Allocation*)。结合前文的理论分析,本文以城市人均工商企业注册数(*Supply1*)和城市创新水平(*Supply2*)表征供给多元化,这是因为前者可以反映城市供给主体的扩张,是供给多元化的"数量基础",它意味着更多元的经济主体进入市场,打破了原有供给结构的单一性,带来了产品和服务的多样化;后者能够体现技术水平的提升,有助于催生更具差异化的产品和服务,从而提高供给的多元化水平。对于就业水平(*Employment*),本文计算各城市上市公司员工人数的总值并取对数,以此作为城市就业水平的代理变量,该指标能够在一定程度上体现城市吸纳劳动力的能力。对于资源配置(*Allocation*),本文以各城市的资源错配程度衡量,具体测算方法参见刘诚和夏杰长的研究[④],城市资源错配程度越低,代表资源配置效率越高。

表3列(1)和列(2)是对供给多元化(*Supply1*、*Supply2*)的回归结果,*DID*系数均显著为正,表明市

表3　机制检验

变量	(1) *Supply1*	(2) *Supply2*	(3) *Employment*	(4) *Allocation*
DID	0.001**	0.140***	0.163**	-0.094***
	(0.000)	(0.031)	(0.082)	(0.027)
常数项	-0.021	-4.713***	11.048***	-0.111
	(0.019)	(1.447)	(3.696)	(1.194)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1974	1974	1974	1974
R^2	0.878	0.964	0.947	0.857

①张林,蒋李雯,丁晓兰:《数字普惠金融发展能够缓解金融要素扭曲吗?》,《财经问题研究》,2025年第4期。

②本文还进行了改变聚类层级、剔除直辖市样本以及排除其他政策干扰的稳健性检验,限于篇幅,未做展示,备索。

③江艇:《因果推断经验研究中的中介效应与调节效应》,《中国工业经济》,2022年第5期。

④刘诚,夏杰长:《线上市场、数字平台与资源配置效率:价格机制与数据机制的作用》,《中国工业经济》,2023年第7期。

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显著促进供给多元化。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供给多元化能通过更好满足市场多样化与个性化需求促进居民消费,其带来的产品和服务在多维度的丰富性,可以让不同特征的消费者找到契合自身偏好的选择,进而提升他们的消费意愿并促成购买行为。假设H2得到验证。

表3列(3)是对就业水平(*Employment*)的回归结果,*DID*系数显著为正,表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带动了城市就业。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就业提高意味着更多居民获得稳定收入来源,增强了居民的消费能力和消费信心,从而直接推动城市整体消费水平的提升。假设H3得到验证。

表3列(4)是对资源配置(*Allocation*)的回归结果,*DID*系数显著为负,说明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实施显著缓解了城市资源错配,优化了城市资源配置。根据前文的理论分析,优化资源配置能够推动生产效率提升,进而促进商品价格下降,同时能够引导产业供给更好地匹配市场需求,在此基础上,优化资源配置可以从提升居民的购买力和激发消费意愿两方面促进居民消费。假设H4得到验证。

(二)异质性分析

1. 基于地理区位的异质性

我国不同地区在经济发展水平上存在较大差异,并由此引致了居民消费观念的区域性分化[①],并且,各地区的消费结构也并不一致[②]。基于这一现实背景,有必要考察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不同地区居民消费水平可能产生的差异化影响。具体来说,本文按照地理区位将样本划分为东部和中西部两个子区域进行回归。表4列(1)和列(2)的估计结果显示,负面清单制度显著提高了中西部地区的居民消费水平,而在东部地区这一结果并不显著。出现这一结果的原因可能是,与东部地区相比,中西部地区行政垄断程度相对较高[③],并且,西部地区的营商环境也处于落后状态[④],这些因素共同抑制了企业进入市场投资的积极性。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抑制地方政府在市场准入领域的过度干预,优化市场环境,恰好有效缓解了中西部地区的发展痛点,因此对该地区居民消费水平的提振效应更为显著。相比之下,东部地区行政垄断程度较低,营商环境较为完善,从而制度改革带来的边际改善空间有限,故政策效果未呈现显著性。因此,研究结论表明,放松市场准入管制不仅是释放中西部地区消费潜力的直接手段,更是激活欠发达地区经济增长、弥合区域发展差距的重要引擎。

2. 基于城市行政等级的异质性

因为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这类高行政等级城市与一般地级市在市场主体活力以及消费水平等方面存在差异,所以在不同行政等级的城市中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的制度红利释放强度以及对居民消费的拉动效果可能存在差异。基于此,本文需要检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在不同行政等级城市中可能存在的差异化政策效果。具体来说,本文将直辖市、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划为高行政等级城市,其他的则为低行政等级城市,并进行分组回归分析。表4列(3)和(4)的估计结果显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提高了行政等级较低城市的居民消费水平,但是对行政等级较高城市的居民消费影响不显著。可能的解释是,第一,与高行政级别城市相比,低行政级别城市的市场主体密度和竞争强度相对较低,从而市场准入放宽后新增市场主体对市场结构的改变更为明显,对供给多样性和价格竞争的影响更为直接,在此基础上,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行政等级较

①姚鹏,王雨彤:《公共消费能否牵动居民消费》,《财贸经济》,2025年第5期。

②纪建悦,隋雨桐,于李娜:《省际贸易对居民消费影响的理论分析和实证研究》,《中国管理科学》,https://doi.org/10.16381/j.cnki.issn1003-207x.2024.0614,2025.10.26.

③邱兆林,王业辉:《行政垄断约束下环境规制对工业生态效率的影响——基于动态空间杜宾模型与门槛效应的检验》,《产业经济研究》,2018年第5期。

④徐紫嫣,夏杰长,姚战琪:《人力资本对服务消费水平的提升效应——基于城乡居民服务消费差距视角》,《经济与管理研究》,2024年第6期。

低城市的居民消费水平表现出更为明显的提升作用。第二,省会城市和副省级城市大多作为国家或区域经济发展战略的核心支点,经济基础比较好,并且率先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商业配套体系,消费形态也更趋多元化,从而具有较高的消费水平,与之相比,部分普通地级市的消费水平可能稍弱。基于此,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普通地级市的居民消费的边际改善作用更大,而对高行政级别城市的居民消费水平的提升空间有限。因此,研究结论表明,放宽市场准入是释放下沉市场消费潜力、盘活中小城市经济活力的重要途径。

3. 基于消费水平的异质性

高消费水平城市与低消费水平城市在商品与服务供给能力上往往存在差异,故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增加供给选择所产生的消费刺激效应在这两类城市中可能呈现出不同强度的影响。本文参考张杰等的研究[①],按城市居民消费水平中位数,将样本划分为低消费水平和高消费水平两组,并进行分组回归。表4列(5)和(6)的估计结果显示,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显著促进了高消费水平城市和低消费水平城市的居民消费,并且对低消费水平城市的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更显著。原因可能在于,低消费水平城市往往面临更严重的供给不足问题,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降低准入门槛,促进新企业进入和既有企业扩张,能够有效缓解供给不足的问题,进而释放低消费水平城市被抑制的消费需求,相比之下,高消费水平城市的供给相对充裕,从而该项制度的边际效应较小。因此,研究结论表明,在当前着力扩大内需的背景下,深化市场准入改革是满足中低消费水平地区居民美好生活需要、释放其消费潜力的重要途径。

表4　异质性分析

变量	(1) 东部地区	(2) 中西部地区	(3) 行政等级高	(4) 行政等级低	(5) 消费水平高	(6) 消费水平低
DID	-0.007 (0.008)	0.075*** (0.014)	-0.009 (0.014)	0.041*** (0.009)	0.024** (0.012)	0.053*** (0.015)
常数项	9.709*** (0.402)	9.070*** (0.490)	8.678*** (0.742)	9.475*** (0.356)	8.678*** (0.480)	9.547*** (0.590)
控制变量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时间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城市固定	是	是	是	是	是	是
样本量	700	1274	245	1729	986	949
R^2	0.956	0.830	0.943	0.862	0.917	0.865

六、结论与启示

本文以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市场准入管制放松的准自然实验,使用地级市面板数据,采用双重差分方法,考察了市场准入管制放松对居民消费的影响。研究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能够显著促进居民消费,这说明该项制度通过打破准入壁垒,从源头上为消费市场注入了活力。机制检验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通过促进多元化供给、促进就业以及优化资源配置促进居民消费,这精准回应了现实中有效供给不足、就业不稳定与资源配置低效对居民消费的深层次制

①张杰,刘冲,张凯恒:《数字消费何以吸引城市外资流入?》,《消费经济》,2024年第6期。

约。异质性分析发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对居民消费的促进作用在中西部地区、行政等级较低的城市、居民消费水平较低的城市中更加显著,这一结论深刻反映了我国区域发展不平衡的现实,它表明,在市场发育相对滞后的地区,制度松绑带来的边际效应更高,这为实施区域差异化的消费提振政策、解决发展不平衡问题提供了明确的方向。

基于研究结论,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坚持将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作为深化"放管服"改革、激活消费市场的重要依托。一是建议建立清单的动态调整机制。可以根据国际形势以及我国经济发展的变化,持续更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的内容,不断修改清单的禁止和限制类准入措施。二是建议建立第三方评估机制。可以通过引入第三方评估机构等方式建立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实施效果的评估机制,提升政府在落实这项制度中的积极性。

第二,围绕供给、就业、资源配置三大传导机制精准施策,构建激发消费潜力的长效机制。一是针对健康、养老、教育等消费短板领域,系统性清理各类隐性准入壁垒,确保负面清单制度"非禁即入"的原则真正落地,从而通过增加高质量和多样化供给,从根本上解决供需错配问题。二是联动人社部门与教育机构,针对新放开领域的岗位需求开展定向职业技能培训,以更高质量的就业稳定居民收入预期。三是继续深化要素市场化改革,保障资源流向高效率部门,为居民消费的增长提供持久动力。

第三,实施差异化策略,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一是对于东部地区、高行政等级城市以及高消费水平城市等这类供给相对充裕的城市,可以依托市场准入负面清单探索新兴消费领域的发展(如数字消费、健康消费、绿色消费),通过供给创新挖掘消费新增长点。二是引导东部地区(高行政等级城市)优质企业向中西部地区(低行政等级城市)梯度转移,通过产业协作带动当地供给升级,进一步放大制度对消费的提振效应。三是低消费水平城市应当以补供给为核心,借助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吸引民生类、基础消费类企业入驻,缓解供给不足问题。

[责任编辑:袁朋伟]